



美国 安全 解读

周建明
张曙光 著

- ★ “9·11”后美国安全战略 美国的国防财政资源、科技资源与新一轮“军事革命”
- ★ 核武器、导弹威胁与导弹防御体系 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前景
- ★ 美国“冷战后”战略 面向21世纪的美国战略理念、国防战略的选择
- ★ 美国未来安全环境的利弊和军事力量

新华出版社

美国安全解读

周建明 张曙光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安全解读/周建明, 张曙光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5

ISBN 7-5011-5719-7

I. 美… II. ①周…②张… III. ①国防建设—研究—美国②
国家安全—研究—美国 IV. E712.1 D7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4021 号

美国安全解读

周建明 张曙光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京源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1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719-7/D·916 定价: 26.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序

在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的领域内，战略研究不是一个被足够关注的领域，与国际上研究战略的同行相比，在同一层次上进行研究的工作并不多见。人们平时所谈的国际格局，往往是基于经验基础上对国际形势的概括与判断，但是并不一定具有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所得出的判断更多是经验性的，而一旦经验性的概括与总结形成以后，又往往成为定式，以此来套发展中的形势。对其他国家的分析是如此，提出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时往往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的 80 和 90 年代，这种思维方式还没有受到大的挑战。但是，当世界格局的变动超出人们经验性的知识框架时，挑战就来临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给人以自信，但却不容易准确地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尤其在大国的战略变化所引起的大格局变化时，经验主义的思维更不容易以一个明晰的战略框架来把握这个变动的世界。

触动本书作者去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美国又酝酿着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它不可避免地给整个世界格局带来巨大的变化。而在这次美国的战略调整中，中国的地位已不比以往，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美国这次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容，从 2001 年 9 月 30 日国防部所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相关的战略评估中，已明显地反映出来。与这种态势形成明显反差的，

是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界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惯性中，比如，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那里去，也坏不到那里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多极化仍然是世界发展的趋势等等。虽然小布什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波折，但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原有的思维。“9·11”事件的发生，为中美之间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合作的空间。美国因为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也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上来，从而表现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于是，有了四个月内布什总统的两次访华。这种态势的发展，使持经验主义观点的人受到鼓舞：中美关系终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但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认识往往会有局限，因为它不能证明美国政府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是否与以往的相同，以及作为这种意愿基础的战略框架是否改变。

从美国战略界为这次战略调整所进行的评估中可以看到，新现实主义在美国的战略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的整个战略框架已经发生了变化，追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所没有过的基本战略目标。这是足以引起世界格局变动的重大因素。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追求的都是相对安全。它依赖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和确保相互摧毁和大规模报复。随着战略思维框架的转变，冷战后所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接触战略已经被放弃，而国防转型成为支持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基础。这种战略的目标是战胜所有可能的对手，其中包括特别强调的在长远的未来可能挑战美国的地区大国，中国自然首当其冲。这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都被清楚地作为可能的威胁，进行仔细的评估。在此基础上美国计划所需要的国防能力，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国防转型计划。它的目标是要使美国保持在军事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是世界上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惟一超级大国，在已经没有同等级

的对手和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条件下，给自己所选择的战略目标。它没有给自己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为搞好国际治理，而承担领导责任，以造福于全人类的使命，而是在埋头准备对付未来所有可能的威胁，以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能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不受挑战。这些被认为威胁的来源，在实力上都比美国要低若干个数量级。它显示美国对今天的世界秩序和一个国家的地位仍然要由实力来决定坚信不移，并决心要用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来构筑一个单极化的世界。新的美国战略框架，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研究如何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

“9·11”事件的发生，虽然对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美国已经确定的战略方向，而是把反恐怖主义同加快战略调整结合了起来。在反对恐怖主义战争正在进行的同时，布什总统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执意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随后，布什总统又宣布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为“邪恶轴心”，并已经在策划一场针对伊拉克的战争。3月9日，《洛杉矶时报》披露了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准备把核武器从历来的战略威慑手段改变为战争中实际使用的手段，并计划在需要时将向中国、俄罗斯、伊拉克、伊朗、朝鲜、叙利亚、利比亚使用核武器。这种改变核武器政策，和违反使用核武器道德的做法，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连《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的社论都认为美国一贯指责其他国家是“核流氓国家”，而现在美国自己的行为已经像一个核流氓。这些使人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事实被披露，其实只是说明了一点：在追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在不择手段上走多远。但是，从美国已确定的安全战略来看，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单极世界。问题在于当美国这样的战略目标一经确定，可以对其牵制和约束的力量十分有限，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

结构比以往都要薄弱。

相比之下，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对这种客观形势变化的认识是滞后的，没有对美国的战略调整作出及时的和充分的反应，学术界主流的注意力更多地关注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和外交层面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的研究者在考虑相互关系时关注的显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中美之间在战略视野、战略设计、执行能力上的不对称，并不亚于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上的不对称。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界主流正在被由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自信心，和相信经济发展了对外关系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的信念所裹挟，乐观情绪远远超过了忧患意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大国的成长，所需要的远远超出了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历史从来没有允许过一个缺乏战略能力的国家跻身于强国之林，哪怕这个国家在经济上颇有建树。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上帝也不会特别眷顾一个战略上的弱者。没有战略的能力，就没有安全，也就无法赢得未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感到中国还应该从战略的角度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去认识未来。首先，了解美国的战略和正在进行的调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在此献给读者的，正是作者从这个认识出发，对美国当前战略调整的解读。如果本书能够使读者感到对了解美国的战略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也将因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欣慰。

2002年3月

前 言

近年来，美国是否正在进行战略调整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迥异。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这只是一场学者掀起的过敏性“风浪”。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涉及到整个国际的安全环境将发生变化，它对中国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同时，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内容和重点是什么？是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y）、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国防军事战略（Defense and Military Strategy），还是对外实施战略（External Operational Strategy）？作为局外者到底应如何认识并把握华盛顿的“战略调整”——即，依据于什么以解读其战略调整的方向、内容、实质与国际意义（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着战略调整。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解答。2001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01QDR）。这个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不久所发表的报告，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美国的国防战略已经做了明确的调整。但是，这还没有平息国内的有关争论。对于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本身就有不同的理解，“9·11”以后美国为进行反恐怖主义战争，在国际上开展了多边的合作行动，有人认为小布什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否已经对单边主义做法改弦更张，因而对于美国是否正在进行国家安全战

略的调整更难以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有足够证据表明，美国自 90 年代初开始便致力于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其评估“旧”战略、制订“新”战略的内外动力因素有四：

第一，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使得美国的国际安全态势（Security Posture）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经过与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四十年的对抗，美国自 19 世纪后期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以来，第一次出现世界上不存在能够与其相匹敌的战略竞争对手（A Peer Strategic Competitor）的情况。这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美国“单极独霸”的战略态势，促动着战略思考者、咨询者、决策者重新审视美国的安全环境，调整冷战战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勾画出美国在冷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明确如何通过新的战略运作，以保证冷战中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平衡所致的所谓“长期和平”，在美国独自主控世界安全事务的条件下得以延伸。^①

第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面对与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如果说华盛顿冷战期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威胁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常规军事威胁，那么，随着“苏东战略板块”的解体，悬在美国头上 40 年的危险怡然消失，但众多难以名状的新型威胁又悄然兴起、迅速扩大，如海湾战争所表明的由“无赖国家”对美国友好国家的侵略、区域大国作为潜在对手的崛起、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无限制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的恣意泛滥、以及跨国性犯罪与“非政府”势力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任意渗透。此外，美国还面对着是否要对一些国家的内乱所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的难题。如何面对这些不断上升的新的威胁，特别是其中的“非对称威胁”，如何确定哪

些是美国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并且如何使用有限的战略资源，都是华盛顿所面临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的安全战略调整似乎势在必行。^②

第三，在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中得以佐证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称 RMA）”，成为美国从根本上实行“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的动力保障。1945 年原子弹的出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近半个世纪的军事战略领域内革命性的变化。1991 年美国与盟军打击伊拉克所首次使用的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被西方军事战略学家认为，将导致“军事技术的演变”并引发新一轮“军事革命”。而美国做为这场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必然会由“军事革命”来进一步引起与安全战略调整的互动。^③

第四，美国实施国际安全战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其财政、经济状况所迫。90 年代初“终于赢得冷战胜利”以及“顺当地打败伊拉克”，使得美国政府的“政治资产”空前上升。但是，由于数十年的冷战消耗，以及八十年代里根奉行的“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并不奏效，华盛顿承受着少有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减税”、“减开支”成为美国大众对联邦政府的首要政策要求。老布什由于忽视经济而没有取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于 1992 年争取连任失败，使接任的克林顿政府更加感受到通过战略转型以减少预算压力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无独有偶，1953 年担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正是通过发展核武器、构建战略威慑的战略取向，做到了减少在常规方面的国防开支，平衡了中央财政，促进了美国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繁荣。^④克林顿政府再次面临同样的前景，势必也会从调整国防战略着手，来减少财政支出。因此，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背景也促使国家安全战略的重新构建。

毫无疑问，美国战略调整作为一项长期的公共政策的形成过

程，必然要包含专家论证、公共讨论、共识形成、政策制定、效果评估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的不同内外因素都会影响战略思维、理论、原则及蓝图的产生，也使得这一动态化的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连续与非连续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华盛顿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安全战略动向，就必须紧紧抓住酝酿和讨论这种战略的“公共区域（Public Sphere）”与“话语体系（Discourse Dynamics）”。

考察过去十年间美国新一轮战略考虑的“公共区域”，大致可将其描绘成两条运作轨迹：自上而下、由里及外。“自上而下”，是指由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层对职能部门所下达的战略调研任务；并由政府专门部门研制、撰写的战略报告，最后由决策层核准而形成的战略文献。从1991年到2001年，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美国战略考察成果多达6项：

* 《基本理论评估（The Base Force Review，简称BFR）》（1991）；

* 《自下而上评估（The Bottom - Up Review，简称BUR）》（1993）；

* 《武装部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Roles and Missions of the Armed Forces）审核报告》（1993）；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简称QDR）》（1997）；

* 《国家防务专门小组研究报告（The National Defense Panel，简称NDP）》（1997）；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2001）。

除了上述“国家级”项目外，华盛顿国防与对外的主要职能部门还不断提出专项或辅助报告。其中较具影响力也有6项：

* 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1 世纪的星: 新世纪陆军可拥有的战略技术 (Star 21: Strategic Technologies for the Army of the Twentieth - First Century)》(1992);

*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The Chairman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对 2020 联合展望: 美国为明天准备军事力量 (Joint Vision 2020, America's Military: Preparing for Tomorrow)》(2000);

* 美国 21 世纪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 (The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追求一个国家战略: 为了维持安全、推动自由的联合行动 (Seeking a National Strateg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2000);

* 美国国家利益研究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美国国家利益界定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2000);

*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为国防做预算: 保持目前的力量水平 (Budgeting for Defense: Maintaining Today's Force)》(2000);

* 国家国际情报委员会 (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Board), 《全球趋势 2015: 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 (Global Trend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2000)。

美国新一轮战略考察的另一个运作轨迹,是由内及外,即由政府内专门部门采取惯常的“委托”方式,聘请政府以外的战略研究机构以及人员做专项研究。在过去十年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凸现出“一个核心、多个基点”的架构。长期任职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 (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的文官安德鲁·

马歇尔 (Andrew Marshall), 由于其领导的办公室曾经在 80 年代中后期对苏联战略力量瓦解的“精确推测”, 使得他在历届政府中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核心地位十分显赫, 可谓“九朝元老”。通过不断、频繁的委托研究, 马歇尔与他领导的“净评估办公室”无可替代地成为联邦政府联系非政府研究机构与人员的中心, 以致长期与其竞争的国防部国防情报局也不得不甘拜下风。^⑤

经过多年的委托与合作, 马歇尔以数个著名研究机构作为定点, 慢慢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研究“群体”。其中成果斐然的包括:

- * 位于加州圣莫尼卡、华盛顿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 * 位于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的“国家战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 * 位于华盛顿的“海军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简称 CNA);

- *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简称 AEI);

- * 位于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 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简称 IISS);

- * 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 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 简称 CSBA);

- * 马里兰大学的“转型国家机构改革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Uni-

versity of Maryland, 简称 IRIS)

* 杜克大学“三角安全研究项目”(The Triangle Security Project, Duke University)。

上列所有研究机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在承接马歇尔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其他部门研究委托同时,也独立地进行了战略问题的研究。它们的成果大多数都作为公开文献得以发表,而正是这些文献,或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或者以专门报告的形式,影响并制约着美国冷战后时期战略思考与公共讨论的“话语体系”。稍稍浏览美国的媒体、行政部门或“院外活动”机构为国会议员所做的简报,不难发现它们充斥了与新一轮战略思考相联系的词汇与概念。例如:“接触”、“既接触又遏制”、“非对称威胁”、“无赖国家”、“战略竞争者”、“实力展示”、“第三次浪潮”、“军事革命”、“国防转型”、“非对称战争”、“反进入与地区剥夺战略”、“信息战”、“敏感技术扩散”、“将战场照亮”、“全球天网”、“C⁴ISR”、“精确打击”、“NMD”、“TMD”等等,不一而足。

说到底,任何战略策划的核心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它首先要求明确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面临的各种不同威胁,以及美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上述各方面在美国的战略评估中都必须涉及到,在下面的讨论中也会展开。由于如何界定自身的战略资源(Strategic Resources)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策划与制定的一个重要层面,任何解读华盛顿新一轮战略思考的努力,都必须重点观察美国的战略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个问题在这里稍做介绍。

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资源,首先指国家所拥有的并可用于实施国防与对外政策的“硬力量”。其中包括(1)武装力量,主要指常备、后备军队的人数、军事能力,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即可动员入伍的人力;(2)军事工业生产力,包括战争消耗能源,钢铁、燃料、食品等工业生产规模与军事装备水平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可

转为军用的民用工业设施与生产力；(3) 国防科技力量，即与国防有关的科技研发(R&D)；(4) 中央财政积聚能力，指政府可动用的财政预算与战争状态下的资金征集。其次是所谓“软实力”。这里泛指国家为了国家安全的目标而实施政治外交、经济运作、对外宣传、文化交流等“非军事”方面的能力，比如“经济外交”、“心理战”以及文化影响等，以及战略策划和设计能力。

界定国家战略资源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要对自身拥有的所有可服务于国防与对外政策的能力与资源的动态状况做到“心知肚明”；其次，要对自身拥有的所有可服务于国防与对外政策的能力与资源做到“全力动员”，它受到动员能力的制约；再次，要对自身拥有的所有可服务于国防与对外政策的能力与资源做到“合理配置”。这三个基本要求通常在如下六个决策层面得到反映：

* 预算与税收。战略资源的配置首当其冲在财政预算中得以反映，其中包括国防建设、军事采购、对外援助、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支出计划。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税务政策，如增税或减税政策。^⑥

* 军队结构的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落实，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军队建制和军事力量结构提出要求，是优先发展战略力量还是常规力量，或是重点发展进攻型力量还是防御型力量，都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⑦

* 国防与对外决策机构的建制与人员构成。由于战略的需要，决策与执行机构将发生变化：现存的机构或得以扩大或遭到缩减，同时新的机构也可能产生，此外各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会相应受到重新界定。^⑧

* 调整与主要盟国关系。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要求

对“敌我友”明确划线。通过军援、经援、与外交运作，以加强与同盟国家的长期合作。^①

* 国防科技研发。长期的战略必定要求对国家的潜在战略资源进行有序开发，而研究、发展与国防有关的科学技术，则成为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②

* 发展“软力量”，并力图将此种力量在“一体化”的机制内得以运作。^③

无疑，上述 6 方面构成美国面向 21 世纪安全战略调整的“操作系统”。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一操作体系具有动态属性，特别是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值得注意。

为了引导读者对正在进行的美国战略调整予以注意，并能得出客观、理性的判断，我们依据所能看到的公开文献——特别是 90 年代末的一些重要文献，本着尽可能系统、客观反映现实的原则，力求如实地解读与评论华盛顿自冷战以后到进入新世纪的战略思维轨迹。为了使读者也能对这些文献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书作了大量的引证和介绍。尽管如此，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也难以避免。引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特别是那些关于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的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或坚决反对的，希望读者予以注意。但不管怎样，国内学术界尚未进行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对美国的战略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诚恳地希望本书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并感谢所有为本书写作过程中，在资料收集、翻译以及主要观点与内容讨论中作出过辛勤努力的朋友，他们是黄仁伟、王海良、王寅通、谭再文、郭学堂、胡志勇、门洪华、朱颖。

注释：

① John Leiw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Introduction.

②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 – 2025*, *McNair Paper* 63 (Washington DC: NDU, 2000); William Cohen, *The Secretary's Message*, in *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GPO, May 1997).

③Eliot A. Cohen, *A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Joseph A. Engelbrecht, Jr., et al.,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2025*”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Force University, 1996).

④*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 – 1961* (Washington DC: GPO, 1960 – 1961).

⑤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Decision Briefing, The “*Marshall Plan*”. 12 February 2001.

⑥William S. Cohen,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2000 (Washington DC: DoD, 2000); Ashton B. Carter and John P. White,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Future* (Cambridge MA, and Stanford, CA: MIT Press, 2001).

⑦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10* (Washington DC: DoD, 1996), and *Joint Vision 2020* (Washington DC: DoD, 2000).

⑧Gold, Philip, *Rumsfeld's Revolution: Is the Big Shift in Defense Really Happening At Last?* Discovery Institute, 30 June 2001; *Rumsfeld – Style Military Reform*, *Washington Times*, 8 June 2001. Posted on the Discovery Institute Website.

⑨Robbin E. Laird and Holger H. Mey,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llied Perspectives*, *McNair Paper* No. 6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1999).

⑩Carter and White,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Future*; Carl H. Build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Enterpris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in Warfare* (Santa Monica: Rand, 1999).

⑪Patrick M. Cronin, 2015: *Power and Progress* (Washington DC: NDU, 1996).